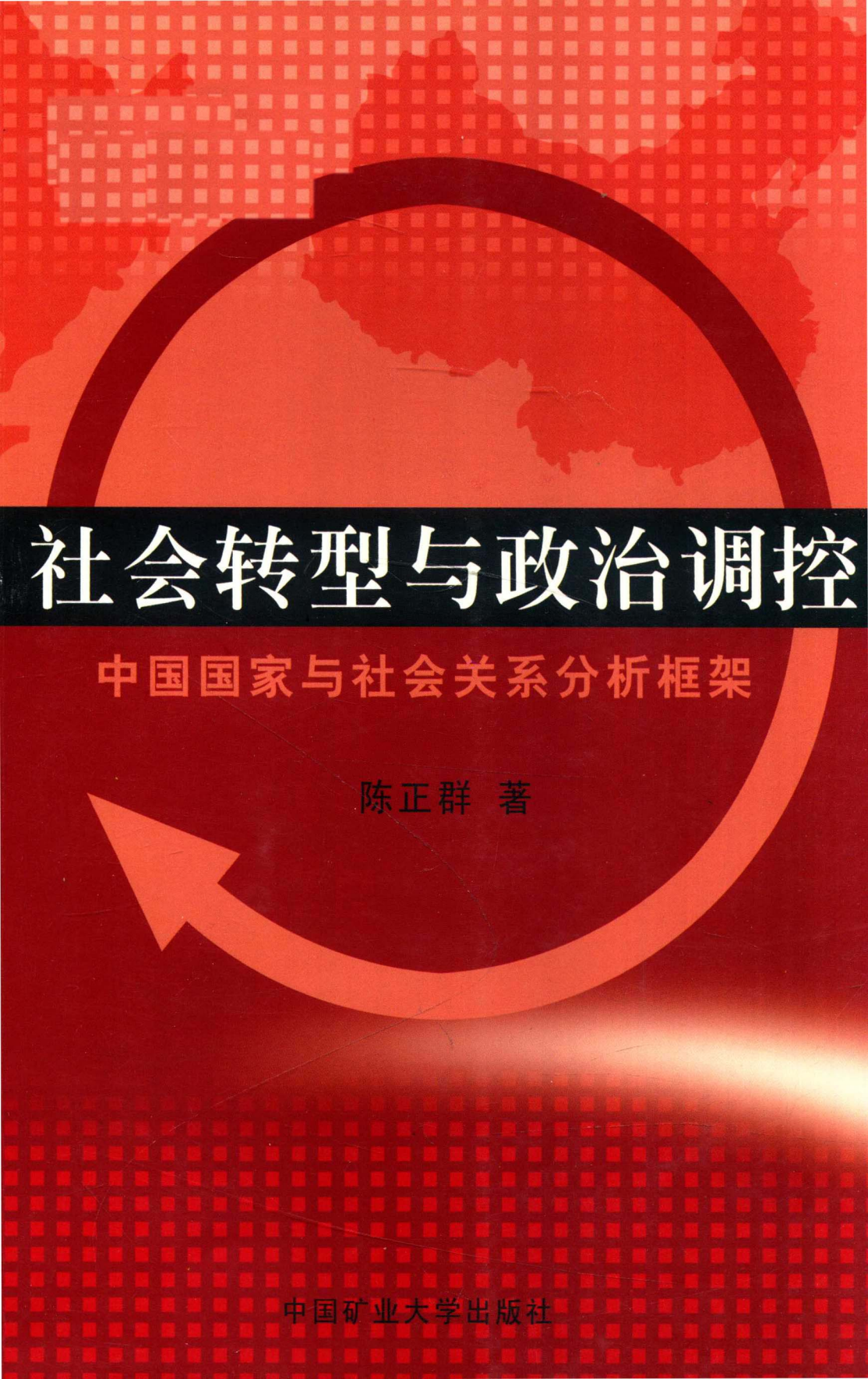




社会转型与政治调控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陈正群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社会转型与政治调控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陈正群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当代中国，政治调控是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变量。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政治调控，关涉到国家成长、社会进步，关涉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本书主要从政治调控的限度、政治调控的缘起、政治调控的制度架构、政治调控转型的社会因素、政治调控的结构性变迁这五个方面就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书可供政治学相关人士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转型与政治调控：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 陈正群著. --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646-1351-8

I. ①社… II. ①陈… III. ①国家-关系-社会-研究-中国 IV. ①D62②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8815 号

书 名 社会转型与政治调控：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著 者 陈正群
责任编辑 史凤萍 孙 浩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 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 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盐城盐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 字数 17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当代中国，政治调控是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政治调控，关涉到国家成长、社会进步，关涉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从国家的角度观之，政治调控是政治系统运作的基础；从社会的角度观之，政治调控是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政治调控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根本保证。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调控不仅是现代化的客观需求，也是政治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书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批判性地吸收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其中包括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原理及方法论以及近年来海外中国问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成果。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或者称之为元问题，由此展开可以涵括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凸现，出现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型构时期。政治调控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调控活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其目的都是为了实施政治调控。历史上，政治调控既有民主的也有专制的形式，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自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政治调控主要存在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四种基本形态。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调控，其活动是多层次的，在这些众多的活动中，国家对社会所进行的政治调控显得较为突出。

政治调控是国家对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实行规范的一种行为，国家是政治调控的主体，政府是国家的主体，但是，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体却有不同的特点，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国家的主体，然而，现实政治中中国共产

党是事实上的国家主体，因此，在研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国家包含着两个主体；社会的主体主要有两类，即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和个人。既然政治调控是国家的一种理性行为，因此，政治调控就存在着限度问题。政治调控的合理限度通常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国家活动是否以社会需求为价值取向；二是政治调控的限度是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做出适时的调整；三是国家是否建立了调整政治调控限度的制度化结构。

一般而言，以政治调控来解析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政治，因为 1949 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基本上是由国家主导的。建立政治调控分析框架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政治调控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制度架构，二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如何调整获取社会资源的制度框架，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资源需求。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如果撇开现代化这个背景既失去其学理价值，又缺乏现实意义，因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政治调控的目标是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

本书由导言，五个章节和结束语构成。导言部分论述了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缘起。

第一章从一般哲学意义上探讨了什么是政治调控，政治调控的合理限度是什么的问题。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任何一种政治流派都把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视为必不可少的目的和手段。亚里士多德把人称为“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意味着政治调控与人类社会是须臾不分的。政治调控是普遍的现象。包括政治调控的概念；社会与国家的属性；政治调控的过程因素和政治调控的限度等。

第二章从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这一大背景出发，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造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政治调控的生成原因，必须在现代化与社会革命这两个背景之下展开。包括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乡土性是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特性，现

代化旧模式的制度性失败以及由以上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的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演进方式。

第三章论述了政治控制的制度架构：组织网络；意识形态；计划经济制度；群众运动。政治调控价值目标的实现总是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来完成，这些要素在政治调控过程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完成特定的目标，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与维护通常是由体现国家和社会意志的法律规范来完成的，这样的政治调控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化控制。

第四章论述了政治调控转型的社会因素。1978年之后，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逐步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变革。这一变革从根本上催生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培育了推动中国政治调控转型的社会力量，从而开启了“社会型塑国家”、“国家型塑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些因素包括：市场导入成为社会变迁之源；出现社会分层和社会各阶层对资源占有的不平衡；组织社会化：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的特性发生了改变，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些组织的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新经济组织发展迅猛，也成为政治调控转型的社会因素之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出现分化和冲突：1978年之后，市场经济冲击着官方政治文化的经济基础，市场导入产生了分离两种政治文化的社会力量，大众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生长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只能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价值形态。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显然是一对难以兼容的价值形态。两类政治文化在价值层面的冲突特性就凸显出来。

第五章论述了政治控制的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有步骤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也在这场经济制度的变革中进行着悄悄地“革命”。社会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传统社会开始分化，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合法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格局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阶层结构也表现出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的特点。然而，社会结构变迁不仅仅表征了社会学意义，它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学意义。社会结构的变迁动摇了国家与社会合一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这种变迁过程中开始分离，社会产生

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国家目标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从冲突的角度看，社会在组织、制度和价值观三个层面上与国家形成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的存在从制度上削弱了国家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以社会现代化为目标取向的政治调控必须顺应社会的变迁态势，不断地调整控制社会的方式和范围，重塑获取社会资源的制度架构，提高整合社会的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其内容包括：国家推动：现代化演展的中国逻辑；市场机制：国家的经济整合；组织结构的制度化重建：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法治：政治控制限度的契约化等。

结束语：在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权力的边界与交换问题，政治学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这种关系的制度结构，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代中国，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在两个前提下型构的：一是主权内的因素，二是主权外的因素。前者表现为社会的全面转型，后者指的是全球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当我们在考量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时，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离开这个前提，任何的政治预言和政治构想都注定是妄言玄思，于政治实践不利，于社会发展不利。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建构，是在这样两个现实背景下进行的：一是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两个背景规定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必然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的民主化过程，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模式选择是国家推动或者说是政党（中国共产党）推动。

政治实践是智慧和理性的活动，中国的政治实践除了非凡的智慧和理性之外，更需要参与活动的人们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去体认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需要借鉴民主国家的政治经验，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开发体制内的资源，使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有利因素。

陈正群

2011.08.28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政治调控的限度	10
第一节 政治调控概念	10
第二节 社会与国家的属性	15
第三节 政治调控的过程因素	22
第四节 政治调控的限度	30
第二章 现代化与社会革命：政治调控的缘起	3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38
第二节 革命后社会的乡土性质	44
第三节 现代化旧模式的制度性失败	52
第四节 社会革命过程	57
第三章 结构与功能：政治调控的制度架构	67
第一节 组织网络	68
第二节 意识形态	79
第三节 计划经济制度	86
第四节 群众运动	92
第四章 嬗变与重构：政治调控转型的社会因素	101
第一节 市场导入：社会变迁之源	101
第二节 社会分层与资源占有	108

第三节 组织社会化·····	119
第四节 一致与冲突：政治的文化张力·····	126
第五章 政治调控的结构性变迁·····	133
第一节 国家推动：现代化演展的中国逻辑·····	133
第二节 市场机制：国家的经济整合·····	140
第三节 组织结构的制度化重建：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	145
第四节 法治：政治调控限度的契约化·····	157
结束语·····	166

导 言

政治调控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调控活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其目的都是为了实施政治调控。历史上，政治调控既有民主的也有专制的形式，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自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政治调控主要存在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全能主义和极权主义四种基本形态。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调控，其活动是多层次的，在这些众多的活动中，国家对社会所进行的政治调控显得较为突出。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或者称之为元问题，由此展开可以涵括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凸现，出现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型构时期。资产阶级为了能够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使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各项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他们需要从理论上为自己的权利进行辩护。在此背景之下，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理论上主要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高于国家”的理论范式，另一派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高于社会”的理论范式。^①

在洛克范式中，社会被认为是自然的，但是这种自然状态存在着三种缺陷：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众所周知的法律”；第二，“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②为了克服这些缺陷，人们订立契约，自愿将部分权利转交给国家，

^① 参见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模式》，转引自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1页。

^② 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78页。

但是国家机构的所有权力都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在这里成了人民保障自我权利的一种工具。但是，洛克的理论范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一种倾向于自决，另一种倾向于政治边缘化。^①前者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是社会吞没国家，而后者则有滑向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潘恩的“最小政府”就是这一理论激进化的代表。一句话，上述两种倾向会造成国家社会化的不良结果。

反观黑格尔理论范式，情形恰好与洛克范式相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探讨了近代社会形态——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私欲间的无休止的冲突场所。这个特性决定了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但却不是自足的共同体。要克服这种缺陷，只有诉诸一个外在于社会的但却是最高的公共机构即国家。因此，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弥补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的缺陷。国家高于市民社会。^②但是，黑格尔理论的最大误导是认为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国家来解决，这在政治实践中往往导致社会国家化的极端结果。对于这一点，罗素曾尖锐地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就都有了借口”^③。

至少在政治学文本中，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一个西方近代的理论模式，它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重视“公共的”与“私人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分界。^④就国家而言，它是14世纪以后的产物，当它逐渐被用来指称政治实体时，是与主权概念的发展相结合的，据此可以认为，没有主权的国家至少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基本特征表现为：其一，它建立了人类与其占有物之间的固定关系；其二，它预设了一个有序权力或统治形式；其三，它维持自身的行为具有专门性与特殊性，因此区别于不属于这一共同体的其他

① 参见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模式》，转引自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③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9页。

④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行为。^①与“国家”概念相比较，“社会”概念有着相似的发展过程。从历史上看，“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的对应物而出现的，“社会”经常被赋予“市民的”、“经济的”和“私人的”特性，并与国家相对峙。在阐述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中，市民社会理论影响最大，它成为西方近代社会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索。既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理论起源于近代西方，那么这种理论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

“社会”、“国家”概念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是海通以后输入的新概念。^②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对中国国家的特征作了如下描述：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从未以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言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故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为淡薄，向内之团结亦不大感觉必要；这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深入人心，于政治实况影响甚深。^③而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更有详论。他指出：与西洋相比，中国实在不像一个国家，在这里，因为缺乏阶级对立，以致国家与社会界限不分，国家消融于社会之中，社会消融于国家之中，社会与国家不像西方那样分别对立。^④在古代中国，家国不分、公私不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帝国的灭亡。^⑤

尽管中国在 20 世纪初就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的特性还无法与西语意义上的“国家”相提并论，其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与社会未实现彻底地分离。国家植根于社会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自现代以来表现出特殊的形态。沟口雄三的同心圆结构理论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种形态的特点。他认为，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既不是只受国家支配的非自立存在，也不是自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我完善的秩序空间，而是通

① 参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国家”词条。

②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6 页。

③ 参见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00 页。

④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2~188 页。

⑤ 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主要的依据是清朝的消亡标志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的主权特性凸现出来。

过共同秩序观念而与国家体制连接起来的连接体。^①在中国，作为国家对应物的社会，基本上不是以制约国家的因素而存在的，这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区别于西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形成这种非制约关系的原因很多，从国家形成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国家就有别于西方：其一，中国国家的出现并非由于生产工具的重大改进，而是与固有亲属组织的变化有关；其二，这种国家并不把以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作为条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并且依赖血缘组织及其原则。^②很显然，运用西方的国家—市民社会范式来解读中国现象其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热潮，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一些学科从不同的角度试图使西方的这一理论本土化，并使之能够成为解构和建构当代中国的理论工具。尽管这些研究有相当程度的理论价值，然而当这一理论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验范式时，其说服力就显得异常的苍白。正如有的学者的评论的那样，中国学者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其一，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选择的是一条不是来自本土经验和知识的西方版道路，他们认定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方式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而且坚信西方制度移植于中国的可能性；其二，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非西方国家为什么建构了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雏形却未能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其三，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往往是在中国的现实经验与西方的概念之间做简单的比附，其突出表现是根据西方的定义在中国发展的复杂经验中选择与之相符的那些方面进行意义放大的研究。^③

中国学者之所以对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现代化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走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他们认为这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相似。然而，这样的乐观态度过于

① 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六讲》和《中国青铜时代》（二集），转引自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参见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转引自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盲目。首先，西方的市民社会的发展逻辑恰恰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市民社会是从社会中自发产生，是在与国家对抗当中获得制约国家的权利的，而中国的发展指向即便是通过建立市民社会然后实现政治现代化，其发展的逻辑更有可能是体制内由国家培育市民社会的基础，渐进地过渡到民主政治。^①市场经济的确能够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但是，即使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培育出市民社会，那么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亦一定与西方的市民社会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假命题，国家——市民社会也难以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范式。鉴于此，本书尝试引入政治调控这个分析概念，来剖析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这种分析是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向度内展开的。

政治调控虽然经常出现在政治学文本之中，但是从未成为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分析性概念，在权威的政治学辞书中至今没有发现关于政治调控的政治学诠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将其作贬义的联想只是一种现象化和情绪性而非学理性的思考。政治调控是国家对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实行规范的一种行为，国家是政治调控的主体，社会是政治调控的客体。一般而言，政府是国家的主体，但是，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体却有不同特点，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国家的主体，然而，现实政治中中国共产党是事实上的国家主体。因此，在研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国家包含着两个主体；社会的主体主要有两类，即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和个人。既然政治调控是国家的一种理性行为，因此，政治调控就存在着限度问题。政治调控的合理限度通常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国家活动是否以社会需求为价值取向；二是政治调控的限度是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做出适时的调整；三是国家是否建立了调整政治调控限度的制度化结构。

以政治调控来解析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政治，因为1949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基本上是由国家主导的。建立政

^① 这种逻辑只是这些学者想当然的虚构，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

治调控分析框架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政治调控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制度架构；二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如何调整获取社会资源的制度框架，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资源需求。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层面上展开的，研究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如果撇开现代化这个背景既失去其学理价值，又缺乏现实意义，因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政治调控的目标是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这个历史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调控的过程特征和体制特征。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①尽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有很多说法，甚至有人把周恩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但是从现代化的总体过程来看，1949 年之后的中国无疑是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一部分。学术界将 1949 年之后的中国现代化分为两类，即毛泽东时代的非常规现代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常规现代化。^②第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是革命的现代化，它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而后一种类型则是改良的现代化，它强调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在中国，无论是常规现代化还是非常规现代化，都突出国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因此，政治调控的形态就与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務息息相关。

在非常规现代化建设时期，现代化的指向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来看，政权建设是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即便国家为经济发展制定过各种政策，但是经济建设本质上是为政权建设服务的。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便将其纳入新的制度框架。而国家进行社会重组又面临着来自社会的非社会主义力量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调控就成了建立新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新政权面临的大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这些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方面。从体制外的角度视之，二战后的冷

① 参见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② 参见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战格局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刺激了国家力量的强化。从体制内的角度视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以及对经济形势的错误判断，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走极端，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以国家的高度集权为前提的，这段时期的政治调控有人称之为全能主义（totalism）^①。从国家控制社会这一层面来看，这一时期现代化的目标包括：社会关系的改造、社会重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人的改造和意识形态革命。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革命的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如土地改革运动、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而国家是这些运动的直接推动力。因此，政治调控表现为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来构建社会。这时的政治调控是一种集权型控制。集权型政治调控获取现代化资源主要通过组织网络、计划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等组成的制度架构来完成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富强、民主和文明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有步骤地引进市场因素，因此，传统集权型政治调控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获取物质资源的功能逐渐为市场经济制度所代替；社会组织出现削弱了政治组织的社会整合、利益整合和价值灌输功能；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社会组织，在价值层面和政治层面上与政治组织形成一定的结构性张力，削弱甚至瓦解了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的政治调控功能。种种现象表明，社会力量的提升事实上阻碍了国家在社会之中主导地位的延续，传统政治调控获取现代化资源的制度架构无法适应社会的急剧变迁，它只能带来社会资源在国家方面更进一步地流失。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却又无法忽视国家推动这个历史逻辑，因此，重构政治调控获取现代化资源的制度架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从经济的和政治的两个方面认识。

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① 邹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一书中首次提出用“全能主义”来定位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保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推进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步伐；第三，培育和完善市场；第四，弥补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①第五，平衡利益分配。在民主建设方面，国家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治权威的维护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撑。亨廷顿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必须首先解决权威问题。^②权威是发展中国家通往民主化道路的必要条件，中国的实践也是如此。其次，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需要国家力量。任何一种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中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尤其如此。最后，民主政治资源的成长需要国家力量。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民主政治资源更多地表现为在体制内由国家培育。总之，在常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现代化采取改良的方式，政治调控就呈现出以生产力推动为核心的制度控制的特征。构建新的政治调控的制度架构必须兼顾到三个目标：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因此，政治调控的结构性变迁主要是对原有的制度架构进行调整：以市场经济制度代替计划经济制度，建立国家整合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以政治组织为主导的组织结构，实现国家对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改造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乌托邦”政治神话，使意识形态实现世俗化转型，从而建立国家的文化整合机制。

当代中国，政治调控是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政治调控，关系到国家成长、社会进步，关系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从国家的角度观之，政治调控是政治系统运作的基础；从社会的角度观之，政治调控是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政治调控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根本保证。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调控不仅是现代化的客观需求，也是政治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书对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同时批判性地吸收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其中包括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原理及方法论以及近年来海外中国问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

① 参见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401页。

② 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